

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麻宝斌 贾 茹*

【摘要】“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全国调研的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降低,公众的总体公平感在逐渐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公众中降至最低,在90年代出生的公众中略有回升,整体趋势大致呈U型。采用序次 Logistic 等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当代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发现:宏观层面,现代化进程借由物质财富、批判精神和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条路径对代际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诸如“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关乎政治反思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策对代际公平感影响显著。公共生命历程与代际公平感的显著关联表明,自然生命规律无法抵消人口更迭的影响,未来社会的总体公平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关键词】公平感 代际差异 现代化 生命历程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17) 04-0095-20

一、从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认识分歧说起

总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近40年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治道变革。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公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但因没有充足的时间稀释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也缺少不断完备的社会机制来解决各类社会弊端,致使公众总体的

* 麻宝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贾茹,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社会公平感呈现中等水平。^①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变革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嬗变的过程,不同世代的公众因经历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致使其正义观念也相互间产生差别;另一方面,各类公共政策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定、执行、修正、终结,而不同世代的公众因在各自的生命阶段历经不同的公共政策,其处于的社会结构和秉持的社会心理均产生差异,致使各世代公众的正义观念呈分化状态。然而,当前学术界分别开展对代际差异和正义观念两个问题的研究,以代际为视角探索正义观念的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况且,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依旧采取整齐划一的方略,年龄层在公共政策的设置中往往是无效类别。不仅政策制定缺少解决社会不公且关乎世代发展的议题,并且政策执行也没有针对各个世代进行细分。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的设置中,往往忽视对于失业或无业年轻人的社会保障;在就业发展政策的设置中,对于实习青年群体的选择性失效;在住房保障政策的设置中,鲜有涉及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保障性措施等。

所谓正义观是指“人们做出某种判断的潜在依据和价值前提,核心在于公民在不同情境下具体行为所遵循的正义原则”(麻宝斌,2012:60)。公平感则是由公民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公民对不同领域的公平状况的一种心理体验。虽然公平感与正义观之间有所区别,前者是对于社会正义状况的直观感受,后者是判断社会正义状况的内在原则。但是,公平感与正义观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突出表现在:正义观是公平感的逻辑基础,公平感是正义观的外化表现。为此本文将以公平感为线索,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观念的演进脉络。“代”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析概念,本文依照“同期群效应”将当前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众划分为出生于1949年之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众共六代群体。^②而“代际差异”则是指代与代之间的相互区别。“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③是指代与代之间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认知差异。

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现有研究结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其一,

①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全国调研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公众对社会总体的公平状况的平均评分为5.99分(评分区间为1分至10分,分别代表由不公平到公平的程度)。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公众总体的社会公平感呈现中等水平。

② 下文将出生于1949年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众简称为49年前、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公众。

③ 本文中所使用的“代际公平感”一词即为“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指代,是指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群体之间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认知差异,而非公众对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群体之间进行代际转移支付的公平认知。

以张海东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在意识倾向上,越具有地位追求意识的人,对社会不平等越是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张海东,2004a:17),即年龄越大的公众,越对当前社会的不公平状况持积极态度。其二,以李骏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政策的影响,“年龄较大的人认可较少的不平等”(李骏、吴晓刚,2012:126),即年龄越大的公众,越对当前社会的不公平状况持批评态度。其三,以怀默霆(Martin K. Whyt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将年龄作为自变量,检测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年龄的效应呈抛物线状,即“中年人比年轻人或老年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且不公平”(怀默霆,2009:115)。简而言之,倘若横轴代表年龄,纵轴代表社会公平感,第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年龄降低,社会公平感呈现线性下降趋势;第二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伴随着年龄降低,社会公平感呈现线性上升趋势;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年龄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样态呈现U型曲线,中年人的社会公平感最低。

然而,基于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的全国调研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如图1所示,随着年龄的降低,公众的总体公平感在逐渐降低,在80年代出生的受访者中,认为“当前社会总体公平”的人数比例降至最低,占比48.3%,在90年代出生的受访者中人数比例略有回升,占比52.7%,整体趋势大致呈U型,而非呈线性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同时,相较其他年龄段而言,1980—1989年出生的公众社会不公平感最为强烈,其次为1990—2000年出生的公众,即80后群体与90后群体,这与以往研究所关注的中年群体也有所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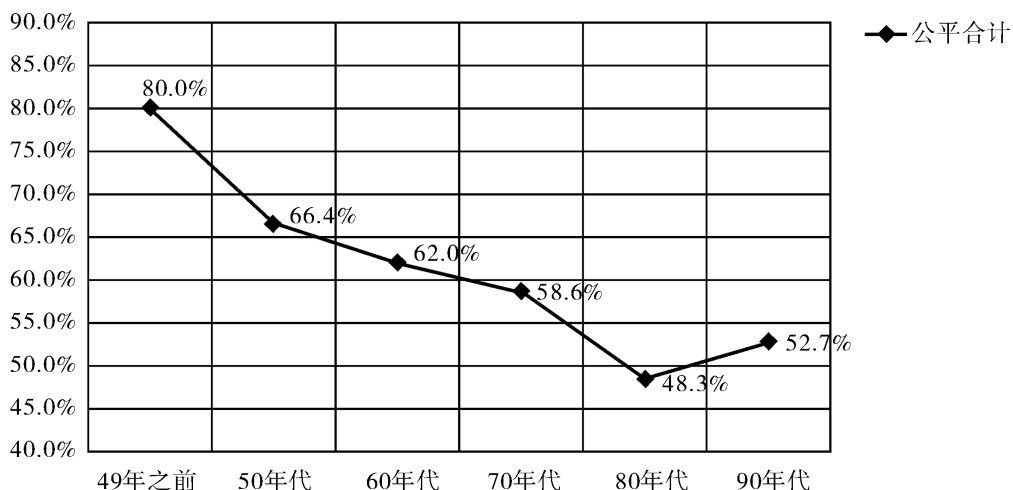


图1 出生年代与社会总体公平状况的交叉制表数据结果折线图

资料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致使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呈现U型曲线的分布特征呢?为此,本文将结合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吸纳相关理论的合理论点,利用调查数据以验证研究假设,试图探析当前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将从时间向度观测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利弊得失,从结构向度挖掘代际公平感所蕴含的阻力与动力。一方面,测量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试图推演公平感的发展脉络以预测未来社会的主流公平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综合理论反思与经验分析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对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影响因素的探析大致可归纳为宏观的现代化进程和中观的生命历程两个层面。

(一) 宏观层面:现代化进程

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化进程是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不断加强的过程,也就是自主立法的现代人依照自身的理智组建和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的过程(郭大为,2005),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现代社会崇尚理性,即认为知识的增长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良(Eisenstadt,2000),从而带来国民物质财富的增加;二是现代社会推崇批判精神(吉登斯,2000),甚至于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现代性态度即是一种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三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Parsons,1971),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权利平等、公平竞争等观念提供了保障(恩格斯,1993)。为此,我们将从物质财富、批判精神和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个维度建构现代化进程对代际公平感影响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1. 物质财富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

既有研究认为现实物质利益获得方面的劣势地位致使年轻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持消极态度(Walder,1995;张海东,2004b);然而,年龄对收入回报的影响呈递减趋势(Bian & Logan,1996)的研究结论却表明年轻人在改革收益获得中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前述观点形成了挑战。我们认为以往研究过于关注个体收入与代际公平感的关系,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家庭财富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一方面,从横向的结构角度出发,中国公众无不处于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和长幼有序的家庭环境当中,家庭收入相较于个人收入而言,更能够影响个

体对于物质资源的安全感，尤其是对于赋闲在家的老年人和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作用更甚。另一方面，从纵向的时间角度出发，自个体出生到死亡，家庭收入虽然时有增减，却一直相伴影响，而个人收入大多显露于成年时期，对童年阶段的影响近乎空白。基于此，本文将以家庭收入替代个人收入作为测量要点。

依据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的匮乏理论，个人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英格尔哈特，2013），也就是说，公众的经济安全感得以提升，其对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诸如注重自我表现、公平正义等）则更为看重，对公平正义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追求势必会引发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Ladd，1978；Gouldner，1980）。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升。^①这意味着，年龄越小的中国公众的经济安全感越高，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轻视，转而在主观上更倾向于公平正义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不公现象便越批判。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收入的增加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

2. 批判精神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知识累积和认知发展对公众起到启蒙作用（Phelan et al.，1995；Kingston et al.，2003），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能力了解到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李骏、吴晓刚，2012）。并且，教育过程本身往往会培育公众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怀默霆，2009）。大致而言，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逐年攀升（剔除“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教育萎缩现象），突出表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逐年增长；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对基础教育逐年占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基础教育在校人口依旧维持在总人口数的10%以上；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含在校人口数和毕业人口数）将会更多。^②这意味着，年轻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老群体，年轻群体的受教育人数多于年老群体，年龄越小的公众的社会认知能力越高，其社会批判意识越强，对社会不公现象越倾向于持批判态度。为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① 《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家庭总收入由1995年的990.38元逐年提高至2014年的10 990.67元；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逐年提高至2015年的31 790.3元；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逐年提高至10 772.0元。

② 依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假设2：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

3. 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分配制度逐步取代了计划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宋晓梧，2005），与市场分配制度相适宜的是应得原则的公平观（Lane，1986；孙明，2009），所谓应得原则的公平观是指在公平竞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实现所得与贡献相一致的价值观念（Adams，1965；Homans，1974），这意味着，公众对于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对公平竞争、平等自由等价值便越认同，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接纳程度将会愈低。伴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卢中原、胡鞍钢，1993；樊纲等，2011），年龄越小的公众受市场的影响越深刻，其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便越高，对社会不公现象越倾向于持批判态度。为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3：市场认可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

（二）中观层面：公共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的最初框架主要源起于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Glen H. Elder）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67个孩子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观察记录，试图解释1923—1933年经济大萧条对于孩子们成长的影响，研究成果表明，重大的社会事件或是国家政策，能够重构个人的生命历程（埃尔德，2002）。梅耶则将生命历程范式进一步应用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研究领域，认为国家借助各类社会政策塑造了不同年龄群体的“公共生命历程”（Mayer & Muller，1986）。在公共生命历程中，时间的多面性、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相互融合（郭于华、常爱书，2005），也就是说，相同年龄段的公众生活在同一时期，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形成趋同的社会意识；反之，不同年龄段的公众生活在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社会事件，形成不同的社会意识；而不同年龄段的公众生活在同一时期，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但因处于各自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形成社会意识也可能产生差异。而社会意识的相同或是相异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田丰，2009）。因此，我们认为，自建国伊始，中国历经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政策和公共事件，其塑造着不同年龄群体的公共生命历程，从而影响着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

既有研究主要通过两种路径简述了公共生命历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一是将公共生命历程用于对不公平感的归因之中，例如怀默霆的研究认为“最具有批判性的态度可能来自于中年人，因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失落的一

代’（Lost Generation），而他们中很多人又在国企改革中下了岗”（怀默霆，2009：110）；二是将不公平感作为公共生命历程的结果效应，例如廉思的研究发现转型时期“蚁族”群体因其独特的生命历程而形成了较强的社会不公平感。不难发现，以往研究呈现碎片化、笼统化的特征。为此，本文将系统梳理 1949 年建国前后迄今对公众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国家政策和公共事件，用以测量公共生命历程对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4：公共生命历程显著影响着当前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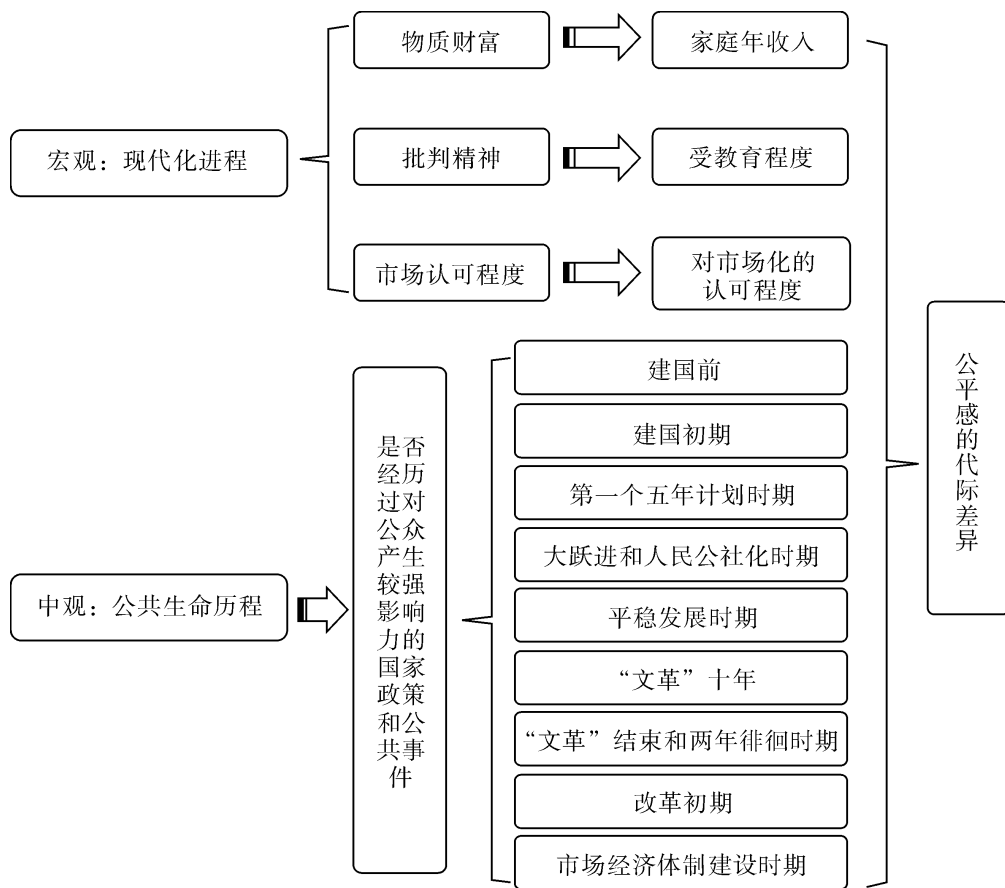


图2 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自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该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运用分层多阶段 PPS 抽样方法，首先将全国划分为直辖市、东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四个抽样框，然后参照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 15 至 64 岁的人口累计数据，分五阶段从每一抽样框中等距抽取 2 个初级抽样单元（省/自治区/直辖市）、2 个二级抽样单元（区/县）、2 个三级抽样单元（街道/乡镇）、3 个四级抽样单元（居委会/村委会）、25 个最终抽样单元（家庭住户），最后在每户中随机抽取 1 人为受访者。项目组共抽取北京、上海、河南、湖南、山东、广东、内蒙古、陕西等 8 个省级单位，19 个区县级单位，32 个街道或乡镇级单位，96 个居委会或村级单位，^① 2 400 位受访者。调查质控严格，访问真实有效。实际执行问卷 2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425 份，回收率为 93.3%，进行加权处理后获取 2400 个有效样本，样本对除台湾、香港和澳门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分析。

(二) 核心变量^②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当代中国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在问卷调查中选取题目“请您根据自己的感受，对社会总体的公平状况作出评价”进行测量，从 1 到 10 的数字分别代表从“很不公平”到“很公平”的程度，倘若受访者选择“不清楚”则计数为 99。

2. 自变量

本研究选取“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个自变量来测量现代化进程对于代际公平感的影响效应。

① 由于在进行实地抽样的过程中，因原中选区、街道或者乡镇拒绝访问，多次努力无果后，重新选取人口规模相似的其他区、街道或者乡镇作为中选抽样单元，故最终抽样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共抽取 8 个省级单位，19 个区县级单位，32 个街道或乡镇级单位，96 个居委会或村级单位，即因不可抗力，在拟定抽样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 3 个区县级单位。

② 下述变量设计主要用于本研究的核心数据分析即序次 Logistic 分析。

我们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低收入家庭（9 999 元及以下）、中低收入家庭（10 000 元至 19 999 元）、中等收入家庭（20 000 元至 99 999 元）、中高收入家庭（100 000 元至 999 999 元）和高收入家庭（1 000 000 元及以上）五类，用以验证物质财富（即经济安全）对公平感代际差异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的高低。

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含大专、高职、研究生）三类，用以验证公众的批判精神（即受教育程度）对公平感代际差异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的高低。

“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将通过题目“您认为现在获得成功的机会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进行测量，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为公众提供了基于自由竞争的平等机会。对当下机会获得的认知是判断公众对市场化是否认可和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基本维度（Kluegel & Mateju, 1995；孟天广，2012）。为此我们用该题目来验证市场化认可程度对公平感代际差异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的高低。此题目的备选项为“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不同意，4 - 非常不同意，5 - 不清楚”。考虑到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两种极端态度所占比例较小，我们把认为“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归为一类，即认可当前的市场化，重新编码为“0”；把认为“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归为一类，即不认可当前的市场化，重新编码为“1”。

3. 哑变量

关于历史情境对公众公平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1949 年建国前后迄今对公众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国家政策和公共事件，并按照政治气候、经济形态和生活状态的不同将“公共生命历程”变量划分为九类，分别为建国前（1949 年以前）、建国初期（1949—195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60）、平稳发展时期（1961—1965）、“文革”十年（1966—1976）、“文革”结束和两年徘徊时期（1977—1978）、改革初期（1979—1991）、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92—2014），在数据分析中将以经历过“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为参照，观测不同的公共生命历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

4. 控制变量

遵循以往的研究惯例，并参照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与核心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在操作中控制了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和居住地。其中，对“宗教信仰”实施了0 - 1 虚拟变量编码，参照组为“无宗教信仰”；对居住地实施了0 - 1 虚拟变量编码，参照组为“乡村”。在操作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年龄变量的控制，观测自变量（含哑变量）对公平感的影响、自变量（含哑变量）与年龄共同作用对公平感的影响。年龄通过“您出生的年份”题目进行测量，故

数值越大,代表年龄越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变量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	低收入家庭	459	19.1	控制变量	长期居住地*	城市	1 107	46.1
		中低收入家庭	615	25.6			农村	1 291	53.8
		中等收入家庭	1 124	46.9		年龄	49 年前	155	6.5
		中高收入家庭	195	8.1			50 年代	327	13.6
		高收入家庭	4	0.2			60 年代	530	22.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267	52.8			70 年代	609	25.4
		高中	774	32.2			80 年代	507	21.1
		大学及研究生	359	15			90 年代	271	11.3
	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	认可	1 314	54.8	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475	19.8	
		不认可	910	37.9		无宗教信仰	1 921	80.0	
	公共生命历程*	建国前	155	6.5		社会公平感	很不公平	175	7.3
		建国初期	74	3.1	不大公平		676	28.2	
		第一个五年计划	182	7.6					
		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	98	4.1					比较公平
		平稳发展时期	250	10.4					
		“文革”十年	717	29.9					
		“文革”结束、 两年徘徊时期	98	4.1					
		改革初期	244	10.2	很公平		256	10.7	
		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时期	580	24.2	说不清楚		134	5.6	

注:(1)*指该项目有效数据有缺失。我们采用比较回答者和未回答者分布的方法来评估数据,同时采用了单变量t检验和 Little's MCAR 检验的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本研究中的数据缺失为完全随机缺失,且缺失值非常少,故将缺失值直接删除,以保证统计模型能够正常拟合。

(2)为了方便观测年龄和公平感的描述性统计状况,我们在此表中将年龄变量和公平感变量进行了分类描述,数据分析则采用年龄变量和公平感变量的原始定量数据进行测量。

资料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三) 分析逻辑

本研究主要测量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公共生命历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实际上,检测现代化进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效应,即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分别需要逐步递进的三次回归分析,如图3所示。首先,检测年龄与现代化进程间的影响效应,即“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家庭年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的判断是否为真。其次,检测现代化进程与公平感间的影响效应,即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对公平感是否有独立的影响。最后,利用序次 Logistic 分析方法检测年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及其他变量对公平感的影响,综合分析代际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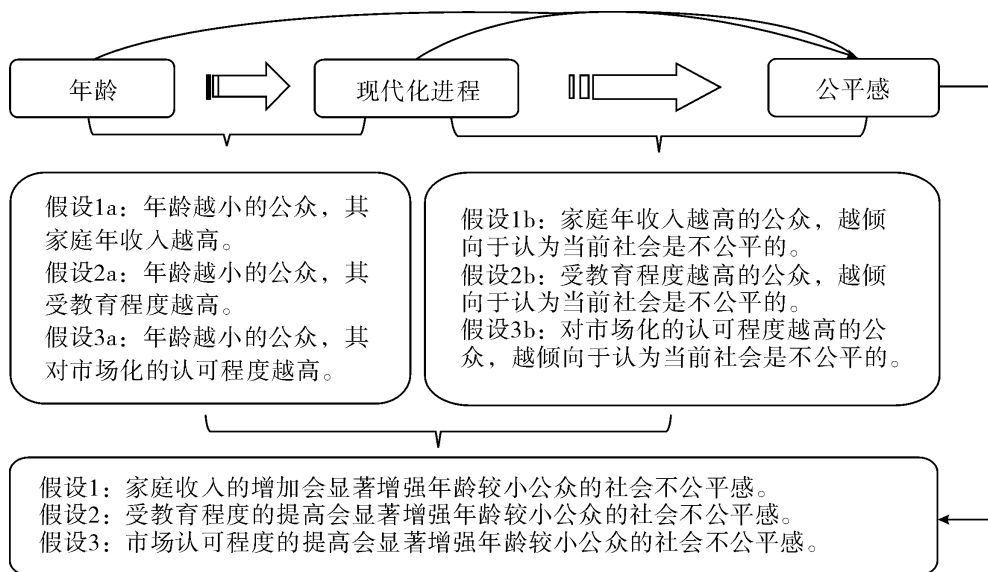


图3 检测现代化进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效应的分析逻辑图

资料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以“假设2: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为例, 该研究假设由假设2a和假设2b两个递进关系的假设构成:

假设2a: 年龄越小的公众, 其受教育程度越高;

假设2b: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不公平的。

数据结果显示, 以年龄为自变量, 以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 两变量间回归系数为0.047, 即年龄的数值越大, 受教育程度的数值越大, 这意味着年龄越小

的公众，其受教育程度越高，证明假设 2a 成立；以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以公平感为因变量，两变量间回归系数为 -0.200 ，即受教育程度的数值越大，公平感的数值越小，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不公平的，证明假设 2b 成立。

同理可证，如表 2 所示，年龄与家庭年收入间的回归系数为 0.027 ，证明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家庭年收入越高；家庭年收入与公平感间的回归系数为 0.089 ，证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

年龄与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间的回归系数为 0.031 ，证明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与公平感间的回归系数为 -0.483 ，证明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不公平的。而年龄与公平感间回归系数为 -0.023 ，从回归分析的角度再次证明了前述研究结论，即年龄越小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不公平的。

在明确年龄与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与公平感间相互关系的前提下，本文将采用序次 Logistic 分析方法，综合分析现代化进程和公共生命历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

表 2 年龄变量与现代化进程变量、现代化进程变量与公平感变量间回归结果分布表

测量一		测量二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公平感
家庭年收入	$0.027 (0.006)^{**}$	年龄	$-0.023 (0.003)^{**}$
受教育程度	$0.047 (0.005)^{**}$	家庭年收入	$0.089 (0.038)^{**}$
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	$0.031 (0.003)^{**}$	受教育程度	$-0.200 (0.064)^{**}$
		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	$-0.483 (0.047)^{**}$

资料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四、调查结果分析

本文将从现代化进程（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

公共生命历程两个维度对转型时期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此,分别设置了4个嵌套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见表3)。模型1是基准模型,只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增加了现代化进程变量;模型3将公共生命历程变量纳入;模型4是最终模型。所有模型均利用复杂抽样设计的序次Logistic回归估计。

表3 序次 Logistic 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现 家庭年收入		0.103		0.122
代		(0.040)**		(0.038)**
化 受教育程度		-0.118		-0.197
进		(0.069)**		(0.066)**
程 对市场化的		-0.442		-0.060
认可程度		(0.048)**		(0.023)*
公 市场经济体				
共 制建设时期				
生 建国前			1.407	1.604
命			(0.744)*	(0.791)*
历 建国初期			1.166	1.377
程			(0.680)*	(0.720)*
变 第一个五年			0.692	0.840
量 计划			(0.576)*	(0.613)*
大跃进、			0.497	0.544
人民公社化			(0.536)*	(0.572)*
平 稳 发 展			0.683	0.742
时 期			(0.448)*	(0.477)*
“文革”十年			0.452	0.564
			(0.314)**	(0.334)**
“文革”结束、			0.257	0.268
两年徘徊时期			(0.294)*	(0.311)*
改革初期			0.235	0.259
			(0.208)**	(0.221)**

(续上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控制变量	年龄	-0.026	-0.019	-0.010	-0.009
		(0.003)**	(0.004)**	(0.016)**	(0.017)**
	宗教信仰	0.017	0.017	0.024	0.018
	(否)	(0.019)	(0.019)	(0.018)	(0.020)
	居住地	0.005	0.001	0.011	0.003
	(乡村)	(0.023)	(0.026)	(0.022)	(0.026)
校正 R ²		0.040	0.101	0.043	0.107
Log Likelihood		2 715.102	2 616.158	2 918.800	2 607.14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括号内为参照群体。

资料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12 & ZD060）。

比较四个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和校正 R² 可知，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解释力优于模型一，而模型四的解释力最优，这表明纳入现代化进程变量和公共生命历程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水平。同时，模型二的解释力显著优于模型三，这表明相较于公共生命历程而言，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有更强的解释力。模型一的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城乡二元的居住结构两个变量未能对公平感的代际差异产生影响，年龄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回归结果显著再次证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存在代际差异的现实状况。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引入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个变量，用以检测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效力。数据显示：其一，年龄对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对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年龄越小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结合前述“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家庭年收入越高”的数据结果，综合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收入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证明假设 1 不成立。其二，受教育程度对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结合前述“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数据结果，综合数据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

感,证明假设2成立。其三,市场化的认可程度对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结合前述“年龄越小的公众,其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的数据结果,综合数据分析表明,市场认可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证明假设3成立。

模型三用以检测公共生命历程对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效应,数据显示,公共生命历程的各变量与公平感变量间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仅仅经历过“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的公众而言,经历过“建国前”等其他历史阶段的公众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在时间上越远离当下的公共生命历程变量与公平感变量间回归系数越大的数据趋势表明,经历国家政策和公共事件越多的公众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引入了现代化进程变量,用以检测现代化进程和公共生命历程共同作用对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效力。数据显示,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对代际公平感的影响效力和影响方向基本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公共生命历程对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影响效力和影响方向与前述大致相同。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92—2014年)的经历而言,“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历对公平感的影响尤为显著。“文革”十年正是社会动荡不安、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忽视经济发展的时期,公众在“文革”中无论是受益抑或受损都经历了痛定思痛的历史过程,进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新观念,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状况由动荡趋向稳定,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蜕变,这意味着,关乎政治反思、经济改革的公共政策会显著增强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现代化进程与公共生命历程对当前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影响显著,也就是说不同世代的公众因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和公共政策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社会公平感。宏观层面,现代化进程借由物质财富、批判精神和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三条路径对代际公平感产生影响。中观层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而言,关乎政治反思和经济改革的公共政策对代际公平感影响显著。

依据数据结果,我们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公众将逐步取代6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公众,在社会结构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取

得社会话语权，总体社会公平感将会出现下滑趋势，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将成为社会常态。之后的10年，即在未来的第二个十年，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生的公众将逐步取代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公众，占据优势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总体社会公平感将会出现上行趋势，兼容并蓄、积极进取的态度将成为社会常态。^① 上述预测是建立在常态发展的社会环境基础上，不排除非常态的经济政治形势对于社会公平感的发展趋势所造成的冲击。需要强调的是，总体社会公平感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是弊端，同样总体社会公平感的上行并不意味着是优势。社会公平感的走向是一体两面的现实状况，可以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客观依据，而非坐以待毙或是守株待兔的社会理由。公众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越强烈，政策制定和执行越要善加利用此种批判意识，加紧塑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公众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态度越包容，政策制定和执行越要善加利用此段时间使政策得到缓冲和调试，减少社会成本、降低社会消耗。

具体而言，代际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及相关的政策建议可分解为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家庭收入的增加没有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的数据结果表明，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并未出现学界所担心的如“Easterlin悖论”般物质财富对公平感的影响效力呈边际递减的趋势，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依然起到正向作用，这可能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并未达到边际递减的拐点相关联。同时，此研究发现对英格尔哈特的匮乏理论提出了质疑，初步推测其原因可能是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多元观念，致使中国公众在对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判断时，并非单一地依据早年物质生活的匮乏与否来培育自身的价值观念，而可能是不断衡平的比较心理等其他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依照研究发现可知，中国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应该继续坚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本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国民

^①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伴随着老一代公众的逝去，年轻群体将逐渐取代年老群体，整个社会的主流公平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代际差异仅仅是短暂的生命周期效应，年轻人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公平感增加，以至于当他们年老时就会变得和当前年老群体持有相差无几的社会公平感，整体的社会公平感并不会发生改变。我们测量生命周期变量和代际公平感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两者间并未统计显著，同时，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生命历程所关注的同期群效应将会推演出社会价值观发生改变。为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更多地形塑于社会演进，而非生命演变的自然规律，当老一代公众逝去，年轻一代公众取代年老一代公众时，整个社会的主流公平感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财富的增加。这不仅可以培育中国公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同时在一定限度内有助于当前中国公众总体社会公平感的有效提升。

其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的数据结果表明，年龄越小的公众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教育过程越完备，其所持有的批判意识和自省精神便越广泛而深刻，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态度越强烈。一方面，虽然教育是促成机会公平、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Reimers, 2000；张德祥，1997），但是，教育所培育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却更为显著地影响着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另一方面，虽然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奇西克（Barry R. Chiswick）（Becker & Chiswick, 196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业绩回报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水平。通常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所支配的知识和技能越多，劳动业绩越大，获得的收入便越多，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但是，经验观察显示，在当下中国社会，伴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多，教育回报却日益萎缩，突出体现在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待业人员的增多，高投入与低回报间的矛盾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持有较低的社会公平感。依照研究发现可知，一方面，公共部门要加大对高知识群体的政策宣传力度，采用恰如其分的沟通手段，舒缓其所累积的社会不公情绪，同时，吸纳高知识群体的真知灼见，使教育成果能够反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就业途径、鼓励自主创业，改善因教育回报不足而造成的社会失衡现象。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已成事实，未来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量到普遍提高的国民教育程度，将政策制定的重点由结果公平导向逐步转变为过程公正导向。

其三，“对市场化认可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年龄较小公众的社会不公平感”的数据结果表明，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年龄越小的公众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态度便越强烈。大致而言，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公众因成长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市场经济所内生的契约精神和公平理念更为接纳，更多地从公平竞争、平等自由的角度审视当前社会，故对社会不公现象持更加批判的态度。而年龄越大的公众虽然对计划经济的感知越深刻，更多地受到平均主义价值观的熏陶，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均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的应得原则强烈冲击的同时，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年龄较大公众的社会不公感。依照研究发现可知，一方面，中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更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变“重结果，轻程序”的固有行政思维，通过程序正义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

年龄越小公众的社会批判意识越强的数据趋势迫切要求公共政策实践应早日建立公众主观感受的反馈机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汇集公众的集体智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调动公众的实践经验，在政策监督过程中发挥公众的批判精神。

其四，“公共生命历程显著影响着当前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的数据结果表明，不同世代的公众因在生命轨迹中所经历的国家政策和公共事件不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感受有所差异。相较于出生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的年轻一代而言，生命历程越丰富的年龄群体对于社会不公现象越包容。也许在历经沧桑之后，个体生命的韧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更多面向的社会比较和更为丰富的社会角色，让公众变得精神富足而胸怀宽厚。同时，“文革”十年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历史时期对代际公平感的显著影响揭示出，政治风向和经济形态的重大转变对代际公平感产生深刻影响。“文革”过后整个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公众开始谋求美好的现代生活，同时重视礼节和法度；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意义早已不言而喻，经济形态的转型固然伴随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是所孕育的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社会风貌的焕然一新却大大提升了总体的社会公平程度。依照研究发现可知，一方面，公共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动公共事件的过程中，要始终关注公众的主观感受与客观需求。脱离公众基本需求的公共政策，不仅会在公众的生命轨迹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时会将整个社会置于痛苦的反思和艰难的蜕变之中。另一方面，重大的政治方向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往往会使公众生活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沼，虽然不排除猛药治重症所产生的积极成果，但是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公共政策理应在稳步推进中实现渐变式发展。当前中国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根深于建国迄今的波诡云谲，滋养于现代化进程的日新月异，锻造于社会变革的斗转星移。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社会公平感的代际差异是建立在现世安稳的基础之上，通向的是更为公正的制度环境和更为美好的公共生活。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2000).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恩格斯(1993). 反杜林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研究, 9: 4-16.
- G. H. 埃尔德(2002). 大萧条的孩子们. 田禾、马春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郭大为(2005). 镜像中的生存—现代性的反思与反思的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 1: 10-16.
- 郭于华、常爱书(2005).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5: 93-107.

- 怀默霆(2009).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 1: 96-120.
- 李骏、吴晓刚(2012).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3: 114-128.
- 卢中原、胡鞍钢(1993).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 经济研究, 12: 49-55.
-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13).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张秀琴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麻宝斌(2012). 社会公平正义测评的理论前提与基本逻辑.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5: 57-62.
- 孟天广(2012).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 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社会, 6: 108-134.
- 宋晓梧(2005). 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孙明(2009). 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 社会学研究, 3: 78-88.
- 田丰(2009).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 青年研究, 6: 1-10.
- 张德祥(1997). 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社会科学辑刊, 3: 41-46.
- 张海东(2004a). 城市居民社会不平等态度的代际差别——以长春市调查为例. 青年研究, 11: 14-20.
- 张海东(2004b). 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 社会学研究, 6: 11-22.
- Gouldner, A. W. (1980).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80(10):189-192
- Walder, A. G.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309-328.
- Bian, Y. J. & Logan, J. R.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739-758.
- Ladd, E. C. (1978). The New Lines Are Drawn: Clas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1: 48-53.
- Homans, G. C. (1974).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3(4): 479-502.
- Becker, G. S. & Chiswick, B. R. (1966).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1/2):358-369.
- Phelan, J., Link, B. G., Stueve, A. & Moore, R. E. (1995). Education, Social Liberalism, and Economic Conservatism: Attitudes toward Homeless Peop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1): 126-140.
- Cluegel, J. R. & Mateju, P. (1995). Egalitarian vs. Inegalitaria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luegel, J. R., Mason, D. S. & Wegener, B. F. Eds.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in Capitalist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 New York: Aldine DeGruyter.

◆ 论文

- Adams, J. S. (1965). Inequality is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Intent to Leave Job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67 – 300.
- Mayer, K. U. & Muller, W. (1986).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Sorensen, A. , Weinert, F. E. & Sherrod, L. R. Eds.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Hillsdale, NJ: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Kingston, P. W. , Hubbard, R. , Lapp, B. , Schroeder, P. & Wilson, J. (2003). Why Education Matter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6(1) :53 – 70.
- Reimers, F. Ed. (2000). *Unequal Schools, Unequal Chances: The Challenges to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ne, R. E. (1986). Market Justice. Political Just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2) : 383 – 402.
- Eisenstadt, S. N. (2000).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29(1) :1 – 30.
- Parsons, 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 Hall.

责任编辑：张书维